

臺灣研究宋代經學概況

馮曉庭*

壹、前言

西元一九四九年前後，由於所屬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慘敗，國民政府終而退據臺灣。除了軍隊及官僚體系，伴隨著政權驛動而遷徙移轉的，還包括了從事教育文化以及學術研究工作的知識分子階層。效忠於國民政府的官僚體系與軍隊來駐，強勢地改變了固有的社會結構與政治氣象；而教育文化工作者與學術專業人士的湧入，則提供了扭轉臺灣整體文化意識以及學術活動方式的可能性。衆所週知，在這個時期之前，無論種族屬性或群眾認知為何，臺灣與當時掌控中國地域的政府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屬地。在臺灣意識逐漸高張的狀態之下，日據時代的臺灣已不再是不可觸及的禁忌，而日本帝國統治下臺灣人的學術活動，也就順勢成為近年來學界最熱衷於探研的領域之一。於是，原本因塵封而被視為渾沌的種種議題，在學者們戮力地發掘與探勘之下，開始逐漸體現出較為貼近原貌的面相^①。

專就中國學術當中最具傳統性的經學研究領域來說，歷來對於一九四九年前臺灣住民經學研究的相關認知，大多仍舊以連橫《臺灣通史》的載述為據，然而該

* 馮曉庭，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① 臺灣學界對於日據時期臺灣人學術活動的探討工作，所斬獲的成果已頗為豐碩：在文學方面，陳美紀先生有《日據時期臺灣漢語文學析論》一書（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1年6月）、梁明雄先生有《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一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許俊雅先生有《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2年6月）；在儒學方面，由林師慶彰主編的《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一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10月），足為學者研探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經學的資依。

書〈藝文志〉（〔臺北：臺灣通史社，1921年4月〕，卷24，頁698）所羅列的經學類著作，卻僅有黃敬《周易義類存編》、《易義總論》、《古今占法》以及楊克彰《周易管窺》兩家四種，如是的記錄，似乎是在指陳自開臺以來住民對於經書研讀及經學研究的忽略或漠視。然而，近年來諸多依循著實證而展現的研究成果卻顯示，經學研究活動的確存在於早期的臺灣並且頗具活力^②。

綜合歷史記載、學者著作以及相關論述可以得知：無論活動的時代是先是後、是由清廷入日據或者由日據入民國，曾經於日據時期在經學研究領域有所表現的學者，可以清楚地區分為兩類。一是承襲傳統中國經學研究方式、尚未跳脫清儒窠臼者，如吳德功、洪棄生、胡南溟、連橫、張純甫等人；一是接受西方新思潮、以全新視角檢覈中國傳統經典、提出新見地或新詮釋者，如林履信、郭明昆、廖文奎等人。

儘管研究傳統經學的風氣並未消弭，其間也存在著新舊判然的區分，但是在經過翔實地分析與比對之後，卻可以發現日據時期經學研究者的表現與一九四九年之後臺灣經學研究的發展並無關聯，換言之，臺灣學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有關於中國傳統經學研究的全般表現，倘若不是淵源自學者的全新自我認知，就是外來思潮影響所致。

單純地就論述的內容加以分析，一九四九年之後臺灣經學研究者的種種表現究竟淵源於何？事實上是難以分辨釐清的；然而，在針對研究者的學術背景與出身進行確切歸類之後，則可以發現臺灣的經學研究之所以呈現如是風貌，應該是得力於一九四九年前後來駐臺灣的中國學者。資料結構顯示，屈萬里、戴君仁、林尹、高明、王靜芝、潘重規等來自中國、於經學深心得的先生學者，除了仍舊持續研讀經書、探討經學之外，並且各自講學授徒、培養後進人才，臺灣學界之中的經學研究體系因而建立。

臺灣學界以宋代經學為議題而進行系統的探討，應該肇始於一九六〇年代，首發端緒的是當時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學的屈萬里先生。漫漫四十載歲月之後，經過初步蒐羅統計，截至二〇〇二年六月為止，諸多研究者已經積累了相關學術論文約七六〇篇。七六〇篇學術著作中，以「經學總論類」為數最多，約有三二〇篇；「《周易》類」次之，約一二〇篇；「《尚書》類」約四十篇；「《詩經》

② 根據《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一書所收文獻，可以知道日據時期至少有吳德功、洪棄生等十三位學者對儒學以及經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類」為數頗眾，約一一〇篇；「《三禮》類」約三十五篇；「《春秋》類」約三十五篇；「《四書》類」約一〇〇篇。至於「《孝經》類」、「《爾雅》類」以及「讖緯類」、「石經類」等相關議題，則尚待學者深入研究探討。

就學術史的角度來說，一個歷經了四十載的研討、凝聚了將近八百則討論的議題，的確需要接受較為詳盡的分析與查驗，一方面藉此展現研究成果與特色，一方面緣此凸顯討論的不足與尚待開發的命題。延續著如是思路，以下將按「經學總論」、「《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四書》」等類目針對歷來學者提出的重要議題以及撰寫的重要著作略加敘述，客觀而謹慎地展現臺灣學界研究宋代經學的梗概，為從事宋代經學研究的學者奉上些許建議。

貳、經學總論

一般來說，被學術界歸類為「經學總論」的現代人論著，所關照的範疇或議題通常為以下幾項，即：「時代學風」（包括流變、特定議題、義理問題）、「學派特色」、「經學家相關整體性論述」（包含生平、傳記）、「經書注釋、流傳及版本」（全面性敘述，並非針對單一或某些特定典籍）。換言之，舉凡不以單一或某幾部特定經書為研探範圍的著作，都可以歸入此類。根據初步統計，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經學研究者針對宋代經學而發的「經學總論」類論著約有三二〇篇（包括學者傳記、理學化的義理概念討論），其中探討的重要議題主要有下列數項：

一、探討宋人疑經改經問題

由不信漢、唐舊有《注》、《疏》為伊始，近而全面性質疑批駁固有經學體系，終而秉持深具時代文化意識的立場寔改經過唐、五代、宋中央政府勘定板行的經書文字、篇章，是宋代學者研治經學的重要特色之一。不但宋人本身有所敘議^③，後世學

③ 如王應麟便是說道：「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陸務觀曰：『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引自《困學紀聞·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4月〕，卷8，頁774）。

者如清高宗乾隆年間四庫館臣於編輯《四庫全書》撰寫「書前提要」之際，清儒皮錫瑞編綴《經學歷史》逮於宋代經學之際，近人馬宗霍編寫《中國經學史》，甚或日人本田成之編纂《支那經學史論》之際，都曾經提及宋人「疑經改經」——讀經書治經學的時代特色及其影響。

臺灣學界首度正式標舉宋人「疑經改經」議題的學者，當推執教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屈萬里先生。一九六四年八月，屈先生於《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發表〈宋人的疑經風氣〉一文，除了敘述宋人「疑經」的治經特色之外，並區分宋代學者「疑經改經」的面貌為三大項：

其一，懷疑經義的不合理。

其二，懷疑先儒所公認的經書著者。

其三，懷疑經文的脫簡、錯簡、訛字等。

從論述的內容可以得知，〈宋人的疑經風氣〉提供了後續學者檢視宋人經學的準繩。

依循著屈先生的認識與規劃，葉國良先生於一九七八年完成《宋人疑經改經考》一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8年6月），該書全面性地討論宋代學者「疑經改經」的風貌，撰述範圍的認定標準有三：

其一，懷疑經書全部或部分非前儒所公認聖賢之書。

其二，懷疑經書非古本原貌而予以復原。

其三，考訂錯簡。

上述三項為全書大綱，可以說是縱向貫串原則，至於區分各經、獨立研討，則是橫向編排的原則。雖然並未針對更改經書文字的行為或個案逐一進行檢查，但是經過葉先生的闡述之後，不僅宋代經學家「疑經改經」學術行為的梗概完整呈現，「疑經改經」為宋代學者治經特色的觀點也因而確立肯定。此後學者探究宋代學風，或是以宋代經學家為研究對象，莫不針對其學說當中「疑經改經」的部分詳加探究。

二、探討宋人治經內蘊的轉變

所謂探討宋人治經內蘊的轉變，就是探討宋代經學家對於經書文字的新詮釋以及經書義理的新認識與重新定義。宋代經學之所以表現出異於漢、唐的特色，除了肇因於宋儒懷疑傳承自前人的經書曾遭竄改之外，不信漢、唐《注》、《疏》，為經書另立新說，進而賦予經書全新義理的求新詮釋意識與行為也是要因之一。

針對這項議題，執教於成功大學歷史系的金中樞先生自一九八二年起即陸續有所研討，金先生以經學研究自宋代開國之初即步上「撥棄傳注而提倡經義」為論述基調，陸續檢討了聶崇義、王昭素、柳開、胡旦、种放、穆脩、王沿……等人的治經表現，認為這些學者在宋代經學當代化（脫離漢、唐《注》、《疏》的拘束而創制新義理）的進程中貢獻匪淺。金先生的論述隨後集中收納於《宋代學術思想研究》一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3月），對於日後學者深入研討宋代初年經學風貌與特色可以說頗有啓迪之功。

除了金中樞先生的論述之外，筆者亦曾撰寫《宋初經學發展述論》一書（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6月），針對宋代初年官方的經學政策與其影響，經書及《注》、《疏》刊板印行的過程與影響，新經學風氣的整體發展，新思潮經學家的治經表現等論題進行探討，對於學者瞭解宋代初年的學術風貌與新經學的源起或許小有助益。

三、探討個別經學家的治經特色

就文獻資料來說，有宋一代治經能成一家之言的學者不在少數，然而臺灣學界以宋代經學家治經整體特色為題的論著，依比例而言稱得上為數甚稀，之所以會形成如是狀態，主要肇因於學者研究的主題通常標定於一或二部經書之中，例如僅只探究蘇軾的《東坡易傳》、朱熹的《詩集傳》、蔡沈的《書集傳》。因為其人之治經整體特色受到矚目而形成討論議題、同時相關論述較為深入的宋代學者，截至目前為止計有劉敞、歐陽脩、王安石、王柏、黃震、王應麟等六人。

（一）劉 敞

根據文獻記載，劉敞撰有《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秋說例》、《春秋文權》以及《七經小傳》等經部著作，是宋人治經脫離舊有規範的指標性人物。臺灣學界關於劉敞治經整體特色的論述，主要是筆者於二〇〇〇年撰寫的《宋人劉敞的經學述論》一書（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6月）。該書除介紹劉敞生平及著述之外，主要的討論對象有二，一是劉敞的《春秋》學，一是劉敞的《七經小傳》。

關於劉敞的《春秋》學，筆者關注的事項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脫離《三傳》藩籬，批駁訂正舊說，以自身認識建立《春秋》學詮釋體系。

其二，以較為進步之時代與文化認知發揚《春秋》義理，建立適於宋代的倫理學以及歷史哲學體系。

其三，以當代禮制與《春秋》載錄相權衡，研議能夠充當古今共通典範的禮制。

其四，對於舊傳《春秋》詮釋體系真偽正否的判定與釐清。

至於劉敞的《七經小傳》，筆者則釐析其特色如下：

其一，寔正經書文字、訂正經書篇章。

其二，批駁指摘《注》、《疏》舊說，為經書文字創立新解。

其三，尋求創建合於時代文化需要的經書義理。

其四，依循經書所述建立合於宋代社會的規範與人生普遍性原則。

（二）歐陽脩

歐陽脩為宋仁宗慶曆年間經學研究風氣丕變的關鍵人物，除了《易童子問》、《毛詩本義》等經部專注之外，在〈春秋論〉、〈春秋或問〉、〈正統論〉、〈時世論〉、〈泰誓論〉、〈夫子罕言利命仁論〉等議論性質的文章之中，歐陽脩都表現了與前人不同的經學觀。然而，臺灣學界以歐陽脩為中心主題的探討，多數圍繞於文學成就、文學理論、藝術思想、史學思想等方面，極少述及歐陽脩的經學，唯一對於歐陽脩的經學進行全面討論的，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何澤恆先生，何先生於一九七六年撰寫《歐陽脩的經史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6年6月）一書，於該書上編針對歐陽脩的經學詳加研討。

何先生的論述計有四大部分，《易》學、《詩》學、《春秋》學、其他相關學說，其內容如下：

其一，《易》學方面：

1. 討論歐陽脩「〈繫辭〉非孔子所作說」的內蘊及其意義。
2. 申明歐陽脩「本人言《易》」的解《易》基本精神與認知。
3. 論述歐陽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

其二，《詩》學方面：

1. 說明歐陽脩「《詩》有本末論」的內涵以及歐陽脩擺脫《毛傳》、《鄭箋》言詩的特色。
2. 敘述歐陽脩以文學觀點說詩的《詩經》詮釋特點。
3. 檢討歐陽脩說詩前後差池的狀況及其存在意義。

其三，《春秋》學方面：

1. 討論〈春秋論〉、〈春秋或問〉諸篇所述《春秋》大義，並詳細剖析歐陽脩駁斥《三傳》舊說諸行為與實質說法的意義。
2. 藉〈石五六鶴論〉一文陳述歐陽脩有關《春秋》筆法的觀點與意見。

其四，其他相關學說：

1. 由〈泰誓論〉一文申述歐陽脩「西伯未嘗稱王」的觀點。
2. 討論歐陽脩「《周禮》非周公所作」論點的內容、可信度及其影響。
3. 敘述歐陽脩「《中庸》内容有可疑處」的論點與歐陽脩所以如是認定的原由。

（三）王安石

王安石的經學活動當中，影響最為深刻廣遠的，莫過於《三經新義》的編纂與推行。關於王安石《三經新義》，于大成先生曾撰寫〈王安石三經新義〉一文（《孔孟月刊》第11卷第1期〔1972年9月〕）略作探討，而臺灣學界當中對這個論題用力最深的，則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程元敏先生。

程先生窮數年之力，編成鉅著《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部，全書依《尚書新義》、《詩經新義》、《周禮新義》為序（臺北：國立編譯館，《尚書》部分於1986年7月出版、《詩經》部分於1986年9月出版、《周禮》部分於1987年12月出版）。

《尚書新義》部分，程先生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尚書》專著，於八十五部作品當中輯得《尚書新義》佚文五五八則、各家評論二八二則。

《詩經新義》部分，程先生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詩經》專著，於六十一部作品當中輯得《詩經新義》佚文一〇四〇則、各家評論二七三則。《周禮新義》部分，程先生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三禮》專著，於八十五部作品當中輯得《周禮新義》佚文七三八則、各家評論二一九則。《三經新義輯考彙評》編成與刊行之後，以《三經新義》為中心的「王學」在湮沒六百餘載之後，再次清晰地展現於學者面前，學者不但可以藉此窺知王安石經說的全豹，同時得以掌握其後學者對王安石學說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王學」的影響及其評價也因此確實全面展現。筆者以為，無論由哪一個視角著眼，程先生都可以說是「王學」功臣。

除了蒐集佚文，整理諸家評論，程先生並且針對《三經新義》的相關論題進行系統性探研，而所有相關論述，也一併收錄於《三經新義輯考彙評》書中，所討論

的主題計有：

其一，《三經新義》纂修緣起、編輯過程、該管機構以及刊行頒布——〈《三經新義》修撰通考〉。

其二，參與《三經新義》修撰工作者——〈《三經新義》修撰人考〉。

其三，《三經新義》的推行狀況及其與科學考試的關係——〈《三經新義》與《字說》科場顯微錄〉。

其四，《三經新義》的版本及其流傳情形——〈《三經新義》版本與流傳〉。

其五，「王學」的興衰及其對經學研究風氣的影響——〈王安石雋父子享祀廟庭考〉。

（四）王 柏

王柏為朱子後學，撰有《書疑》、《詩疑》等經部專著，堪稱宋代「疑經改經」學術風潮中的指標性人物，四十年來，臺灣學界討論王柏學術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唯有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程元敏先生卓然有成。

程先生於一九七一年完成博士論文《王柏之生平與學術》一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71年6月），該書區劃為六編，討論的議題計有三大類，即王柏的生平、論述著作、學術成就：

其一，第壹編〈生平〉，敘述王柏身家事蹟，包含「世系」與「年譜」兩項主題。「世系」旨在追尋探究王柏先世，為討論王柏生平事蹟的前導；「年譜」則以年歲為經，以王柏的行蹟（主要是學術活動）、當時重大學術事件以及重要經學家的活動為緯。學者經由年譜，不但可以詳盡地知悉王柏的生平事蹟與學術活動，對於同時期學界的表現，也可以獲得相當完整的認知。

其二，第貳編〈著述考〉，考察王柏的論述著作。全編區分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三大部分。程先生在此不但詳考王柏所有述作的卷帙、性質、存佚狀況，對於業已散佚亡佚的文字，亦竭盡全力蒐羅匯集。

其三，第參編〈理學與《四書》學〉、第肆編〈《尚書》學〉、第伍編〈《詩經》學〉，分別討論王柏的學術成就。之所以作如此編排，係因程先生認為王柏的學問傳承自朱熹，而朱熹教人讀書，「首《近思錄》、次《四子書》」，最終「達乎《六經》」。至於各編討論的重要議題：

「理學」部分主要討論敘述王柏的「宇宙觀」、「心性論」、「修為論」、「格物致知說」以及「敬齋箴圖與人心道心圖」。

「《四書》學」部分除討論王柏對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詮釋之外，也同時論述「程顥、程頤、朱熹的《大學》改本」、「董槐、王柏的《大學》改本」、「朱熹的《中庸》章句」、「王柏的《中庸》章句」以及「王柏研治《四書》的方法」等議題。

「《尚書》學」一編針對王柏的《尚書》學提出五項議題加以研討論述，即：王柏治《尚書》「尊古文《尚書》而不甚非今文」，王柏聯貫〈夏書〉二篇爲一、改訂僞古文〈商書〉五篇、考訂周初書五篇歲月，王柏的「洪範說」，王柏「辨〈周書〉命誥八篇」，王柏所定《尚書》篇第與篇名。「《詩經》學」一編除側重於「淫詩說」的發展歷程以及王柏承繼擴揚「淫詩說」的實質表現內涵之外，並討論王柏解詩的態度與方法、王柏對於《詩經》篇章文字的改定寔正以及後人對於王柏《詩經》學的觀感。

除了上述三大項之外，程先生於第六篇專對王柏學術的淵源以及流傳影響進行考辨探索，對於王柏在宋代經學發展史上的意義與定位深具凸顯確立之功。

（五）黃 震

黃震爲宋末大儒，其治經所得載錄於《黃氏日抄》一書當中（包含〈讀經〉三十卷、〈讀傳〉一卷），臺灣學界對於黃震經學有獨到認識者，當推景文管理學院林政華先生，林先生於一九七七年完成博士論文《黃震之經學》一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77年6月），該書以《黃氏日抄》當中〈讀經〉、〈讀傳〉兩部分爲立論依據，探討黃震經學的特色。

除了論述黃震的經學之外，林先生先於該書首編陳述黃震的學術淵源與著述，論定黃震治經深受四明學風及朱熹、呂祖謙、張栻等人影響。至於黃震治經的特色，《黃震之經學》一書則依《黃氏日抄》所錄條文次第如是論述道：

其一，《孝經》學——《黃氏日抄·讀經》部分之所以首錄《孝經》說，是因爲黃震認爲孝乃諸善本源，學者治經，務必自《孝經》入手。

其二，《論語》學——黃震沉潛鑽研朱熹《論語集註》數十年，頗見心得，因此對朱熹的《論語》說多所寔正直補，同時黃震也批評宋儒對於《論語》要求過深過高，致使《論語》的實質面貌與功能淪喪。

其三，《孟子》學——黃震特別重視發揚孟子匡時救弊的用心與方法。

其四，《詩經》學——黃震認爲〈詩小序〉的詮釋固然有所偏差，但是畢竟完成時代甚早，仍然具備參考價值，因此主張不可全然廢棄不取。此外，黃震解詩追

求合乎情理，對於怪誕荒謬牽強附會之說絕不採用。

其五，《尚書》學——黃震推崇蔡沈在《尚書》學上的成就，多有採擷，然而在採信之餘，也依據經文上下文句勢、語詞虛實與人情義理探究蔡沈《書集傳》解經的得失。

其六，《易》學——黃震認為《易經》是說理明事之書，因此反對邵雍等人的先天圖數，推重《易程傳》與《易本義》。雖然大原則如是，對於程頤、朱熹《易》說闕脫錯誤的部分，黃震也會以自身的認識寔正補訂。

其七，《三禮》學——黃震經過確實考證，認為《禮記》中〈檀弓〉、〈禮運〉等十七篇是戰國以後之文字。此外，黃震也認為，《禮記》諸篇當中錯誤頗多，而舊注（主要指鄭玄《注》）的疏釋也經常出現與經義窒礙扞格之處，必須全數重新檢視訂正。至於《周禮》，黃震以為經文所載錄的官職繁冗重複，敘事又不合乎情理，不可盡信。

其八，《春秋》學——黃震以為《春秋》為孔子直筆，其中並不包含筆削褒貶的深切寓意，自《三傳》以下學者解《春秋》均無法脫離「褒貶筆削」的窠臼，可以說掩蓋了《春秋》經文的正確義涵。此外，對於《經》、《傳》記載扞格的現象，黃震也認為必須以《經》文的載錄為依據，絕對不可因為《傳》文有異說而懷疑《春秋》經文的正確性。

（六）王應麟

嚴格地說，王應麟是宋代（或者說是經學史上）第一位蒐集漢、唐亡佚經說的學者，所編纂的《困學紀聞》一書，紀錄了王應麟的經說。臺灣學界針對王應麟經學進行論述的學者是何澤恆先生，何先生撰有《王應麟之經史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1年6月）一書，對於王應麟的經學有以下之分析：

其一，在《易》學方面。王應麟的《易》學遠承鄭玄、李鼎祚，近繼朱熹，偏重於象數之學。

其二，在《尚書》學方面。王應麟治《尚書》能夠匯通全經，並參考諸家注解，同時能運用其他經書的相關記載。除此之外，王應麟經常援引史事及古史記載解釋《尚書》，同時輯蒐前儒《尚書》佚說。

其三，在《詩經》學方面。王應麟治《詩經》尊崇毛《傳》、鄭《箋》，並且兼採《三家詩》說，同時輯蒐《三家詩》佚說。

其四，在《禮》學方面。王應麟治《禮》學主張通經致用。

其五，在《春秋》學方面。王應麟主張治《春秋》不能侷限於《三傳》的限制之中，必須捨《傳》研《經》，直接就《春秋》經文探尋孔子大義。

除了敘述王應麟研治各經的特點之外，何先生並指出，王應麟治經的基本觀念與朱熹「求訓詁、考據與經文義理一貫」的觀點一致，因此，王應麟雖不喜歡談論性理，卻不能將之排除於朱子後學之外。

參、《周易》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關於宋代《易》學的論述計約一二〇篇，一二〇篇論述所關照的重要議題計有以下三項：「宋代《易》學的整體研究」、「各類（派）《易》學的內涵」、「個別學者的《易》學」。

一、宋代《易》學的整體研究

臺灣學界最早以宋代為範疇，討論當時《易》學整體面貌的學者，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戴君仁先生；一九六二年七月，戴先生於《新時代》第二卷第七期發表〈談宋《易》〉一文，分析宋代《易》學的特色、流派、演變以及影響。在戴先生〈論宋《易》〉一文之後，徐芹庭先生亦曾於《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發表〈宋代之《易》學〉一文（1964年8月），針對宋代《易》學的傳承演變、流派特色以及重要《易》學家的學術特質進行論述。戴、徐兩位先生的論述，是早年臺灣學界關照宋代《易》學整體風貌的僅有成果。

一九七八年，王基西先生撰寫碩士論文《北宋《易》學考》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8年6月），探討北宋學者的《易》學著作。王先生將活躍於北宋時期的《易》學家依「象數」、「義理」、「集解」、「考證」四項標準加以分類，至於無法歸於上述四類的學者，則納入「餘類」。除了就性質將《易》學家予以分類之外，對於諸家著作的存佚，王先生均有注記，同時，對於各《易》學家的生平事蹟、《易》學特色，也都稍做敘述。此外，王先生也蒐羅各家散佚著作的殘餘文字，補綴於該作品之後。基本上，本書性質類似清人朱彝尊所編定的經部專門目錄《經義考》，對於學者查尋北宋時期的《易》學著作與《易》學家頗稱便利，但是卻無法明確地展現北宋時期的《易》學風貌。

一九九四年，輔仁大學哲學系高懷民先生著成《宋元明《易》學史》一書（臺北：作者自印本，1994年12月），對於宋代《易》學有較為全面的敘述。高先生首先說明宋代《易》學的興起與特色，接著便以時代順序為綱，依序敘述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以及朱熹門人蔡元定、蔡淵、蔡沈的《易》學。在論述了各家《易》學之後，高先生又針對《易》學中的「圖書、象數之學」——〈河圖〉、〈洛書〉、〈太極圖〉、〈卦圖〉進行敘述。從敘述的內容來說，《宋元明易學史》所關照的諸《易》學家，的確都是宋代《易》學的指標性人物，而隨後陳述的「圖書、象數之學」，也是宋代《易》學中極具特色的部分，通過本書，學者確實能夠對於宋代《易》學的發展脈絡、時代特色以及影響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除了上述綜論宋代《易》學整體風貌的論著之外，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汪惠敏先生曾於一九八六年撰寫〈宋代《易》學之復古、疑古與改經〉一文（收錄於《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6月〕），專門探討宋人《易》學活動中「恢復古《易》」以及「疑經改經」行為的內涵及意義。在汪先生之後，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許維萍先生於二〇〇一年完成博士論文《宋元《易》學的復古運動》（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6月），針對宋元時期學者《易》學活動中的「古《周易》恢復運動」進行專門討論，許先生於書中針對此議題提出四項結論：

其一，宋人的復古《易》意識與運動是對於漢、唐人《易》學的反動。

其二，宋人的復古《易》運動應該與宋《易》當中的「義理」、「圖書」、「象數」並列為觀察宋代《易》學的重點。

其三，宋人的復古《易》運動展示了宋人治經自我意識增強的現象。

其四，通過《周易》「經」、「傳」文字篇章的重組，或許可以更清晰正確地理解經書義理。

二、研究各類（派）《易》學的內涵

總括而言，宋代《易》學可以大致區分為「義理」、「圖書象數」兩大流派，而設若進一步加以區分，「義理」派《易》學又包含了所謂「史事《易》」——以歷史經驗或歷史事件詮釋《易經》、「心學《易》」——陸九淵心學派的《易》學等類別。臺灣學界關於這些議題的研討成果計有以下兩項：

（一）關於義理《易》學的論述

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林益勝先生於一九七二年撰寫〈宋義理派《易》學的研究〉一文（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72年），為臺灣學界討論宋代「義理《易》學」的端緒。繼林先生之後，陸續有汪惠敏先生撰寫的〈宋代之義理《易》學〉（《輔仁國文學報》第2期〔1986年6月〕）、黃忠天先生撰寫的《宋代史事《易》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6月）、林麗雯先生撰寫的《李光史事《易》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1月）以及康雲山先生撰寫的《南宋心學《易》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6月）。

（二）關於圖書象數《易》學的論述

儘管「圖書象數《易》學」是宋代《易》學的重心之一，但是臺灣學界以宋代整體圖書象數《易》學為中心議題的論述卻為數不多，截至目前為止，僅有劉瀚平先生撰寫的《宋象數《易》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8年6月）以及江弘毅先生撰寫的《宋《易》大衍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1年6月）兩部著作。

三、研究個別學者的《易》學

針對個別學者《易》學所鋪陳的論述，無論在質量或數量上都可以說是臺灣學界討論宋代《易》學的大宗，歷來學者較為熱衷於討論的宋代《易》學者計有以下數家：

（一）胡瑗

關於胡瑗的《易》學，林益勝先生撰有《胡瑗的義理《易》學》一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10月），李煥明先生撰有〈胡瑗的《易》學〉一文（收錄於《易經的生命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李貞慧先生撰有〈胡瑗「周易口義」初探——由周易口義看胡瑗在宋學中之地位〉一文（《中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96年5月〕）。三部著作之中，以《胡瑗的義理《易》學》較具貢獻，不但能全面凸顯胡瑗《易》學的本質與特色，對於宋代義理《易》學的淵源與初始，也有相當詳細的檢討與分析。

（二）張載

臺灣學界議論張載《易》學的著述計有三部，一是陳正榮先生撰寫的《張載

《易》學之研究》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9年6月），一是羅聯緒先生撰述的〈《正蒙·大易篇》釋義〉一文（《建設》第29卷第8期〔1981年1月〕），第三部則是李煥明先生的論著〈張載的《易》學〉（收錄於《《易經》的生命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

（三）程 頤

臺灣學界研究程頤《易》學的學者主要有二，一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胡自逢先生，一是政治大學哲學系曾春海先生。

胡先生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間，即以程頤《易》學為議題陸續撰寫〈伊川《易》學綜要〉等論文計十四篇，一九九五年，胡先生著成《程伊川《易》學評述》一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12月），書中討論主題為：「伊川《易》學之基本思想」、「伊川論《易》卦之動靜」、「伊川論《易》之象數」、「伊川論《周易》之義理」、「伊川辯《易》辭之異同」、「伊川《易》學之源流」。

曾春海先生關於程頤《易》學的主要論述有三：其一，〈伊川《易傳》的哲學〉（《哲學與文化》第20卷第6期〔1993年6月〕）；其二，〈伊川《易》學的天道論〉（收錄於《宋代哲學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其三，〈論《易經》家庭生活的兩性關係及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以伊川《易傳》為據〉（收錄於《《易經》哲學的宇宙與人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4月〕）。

除了胡、曾兩位先生之外，林益勝先生撰有《伊川《易傳》的處世哲學》一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5月），江超平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完成碩士論文《伊川《易》學之研究》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年6月），對於程頤《易》學亦有闡明推廣之功。

（四）蘇 軾

蘇軾撰有《東坡易傳》九卷，臺灣學者當中僅有戴君仁先生以及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林麗真先生針對這個議題進行研討。

戴先生撰有〈蘇軾與朱震的《易》學〉一文（《孔孟學報》第26期〔1973年9月〕），是臺灣學界探究蘇軾《易》學的最早成果。

林先生關於蘇軾《易》學的論述共計三篇，一是〈《東坡易傳》之特質與思想〉（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84年），一是〈《東坡易傳》中的「一」〉

（收錄於《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4月〕），另一篇則是〈《東坡易傳》之思想及朱熹之評議〉（收錄於《宋代思想與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8月〕）。

（五）邵 雍

臺灣學界針對邵雍《易》學進行深入論述的是高懷民先生，關於邵雍的《易》學，高先生撰有專著五篇：其一，〈邵雍先天《易》論史評述〉（《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3期〔1991年9月〕）；其二，〈邵雍先天《易》演天地之數〉（《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6期上〔1993年3月〕）；其三，〈從邵雍先天《易》卦氣看人類興衰〉（《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1期〔1994年5月〕）；其四，〈從《易》學史的發展看邵雍的《易》學成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3期〔1996年12月〕）；其五，《邵子先天《易》哲學》（臺北：作者自印本，1997年3月）。

除了高先生之外，張新智先生亦針對邵雍先天《易》學所展現的歷史哲學觀點於一九九三年撰成碩士論文《邵康節先天《易》學之歷史哲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6月）。

（六）朱 熹

臺灣學界研究朱熹《易》學成果較為豐碩的是戴君仁先生與曾春海先生。戴先生以朱熹《易》學為中心撰述論文三篇，分別為〈朱子的《易》學〉（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65年）、〈朱子的《周易本義》〉（《書目季刊》第2卷第3期〔1968年3月〕）、〈朱子《易本義》的注解〉（收錄於《梅園論學三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7月〕）。曾先生的三部著作分別為：〈朱熹《易》學的形上學〉（哲學論集第15期，1982年7月）、《晦菴《易》學探微》（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年5月）、〈朱子《易》學宇宙論〉（《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12期〔1983年6月〕）。

除了戴、曾兩位先生的論著之外，臺灣學界探討朱熹《易》學的重要著作，還有江弘毅先生的《朱文公《易》學研究》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5年6月）。

肆、《尚書》

從一九四九年至今，臺灣學界以宋代《尚書》學為題而鋪陳的論著約在四十之譜，討論的主題則包括「宋代《尚書》學整體研究」、「特定議題」、「個別學者的《尚書》學」。

一、宋代《尚書》學整體研究

臺灣學者當中最早針對宋代《尚書》學整體風貌進行探討論研的，是成功大學國文學系宋鼎宗先生，宋先生於一九七二年發表〈漢宋《書經》學〉一文（《中國學術年刊》第1期〔1976年12月〕），開啓學界對於整體宋代《尚書》學的鑽研。其後，宋先生又完成〈宋儒《尚書》學之寓作於述〉（《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篇第20卷〔1985年7月〕），討論宋代《尚書》學者於解經之際同時闡述自身意見、發揮義理認知的學術特色。在宋先生之後，汪惠敏先生也以宋代《尚書》學為題撰寫了〈宋代之《尚書》學〉一文（《輔仁國文學報》第3期〔1987年6月〕），區分宋代《尚書》學作品為「注疏」、「疑古」兩大類，同時也針對宋代《尚書》學者的經世思想略行發揮。

至於全面討論宋代《尚書》學的專書，臺灣學界唯有蔡根祥先生所撰寫的《宋代《尚書》學案》一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4年6月）。蔡先生以《宋元學案》編排措置的學術體系為藍本，自宋初學者郭忠恕至南宋學者黃倫，共計論述宋代《尚書》學四十八家，涵蓋範圍可謂廣泛完整。書中對於各家《尚書》學的淵源、特色以及良窳均有所說明，雖然因為研究議題巨大，無法針對各家學說進行最深層探論，但仍舊不失為臺灣學界探討宋代《尚書》學的重要指標。

二、研究宋代《尚書》學中特定議題

臺灣學界針對宋儒《尚書》學中特定議題進行討論的學者，截至目前只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蔣秋華先生，蔣先生精研宋代《尚書》學，對於宋人的「洪範學」深具認識，於一九八二年完成《宋人洪範學》一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2年6月）。該書論述的重點如下：

其一，宋人對於〈洪範篇〉經文字義的疏解，包括「陰鷲」、「九疇」、「金曰從革」、「睿作聖」、「皇極」、「三德」、「沈潛」、「高明」、「作威」、「作福」、「玉食」、「貞悔」、「衍忒」等十三組詞句。

其二，宋人洪範圖書象數說，包含宋人的〈河圖〉、〈洛書〉說，宋人所作的「洪範圖譜」，宋人的「洪範象數」說。

其三，宋代《尚書》學家對於〈洪範篇〉經文的質疑與改訂。

其四，〈洪範篇〉與宋代理學的關係。

除了蔣先生之外，汪惠敏先生曾經以宋代《尚書》學與當時政治的關係撰寫〈宋儒「尚書」學在政治上的應用〉一文（《輔仁國文學報》第10集〔1994年4月〕），探討宋代《尚書》學者援引《尚書》義理匡輔時政的狀況與所見功效。

三、研究個別學者的《尚書》學

由一九四九年至今，較受臺灣學者重視並且為文研討論述的宋代《尚書》學家計有程顥、程頤、王安石、蘇軾、林之奇、朱熹、蔡沈、王柏等八人，而學界對於各家的討論狀況如下：

（一）程顥、程頤

程顥、程頤並未針對《尚書》進行專門論述，後人探討二程關於《尚書》的見解，必須由《語錄》以及相關單篇文章入手。一九九一年，蔣秋華先生完成博士論文《二程〈詩〉〈書〉義理求》（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1年7月），是臺灣學界截至目前為止專就二程《尚書》學進行討論的唯一著述。

《二程〈詩〉〈書〉義理求》標舉二程《尚書》學重點有三：

其一，懷疑〈泰誓〉、〈武成〉、〈金縢〉等篇經文的真偽性質。

其二，改動調整〈武成〉篇的文章字句順序。

其三，申論《尚書》所言及的古先聖人道德行儀絕無偏差，亦即高倡所謂「聖人無過論」。

其四，詮釋〈大禹謨〉「十六字真言」所述「人心」、「道心」的內涵指歸、哲學範疇以及道德修養意義。

（二）蘇軾

蘇軾撰《東坡書傳》二十卷，林麗真先生曾經針對《東坡書傳》有所論述解析，分別撰成〈《東坡書傳》之疑古精神〉（《孔孟月刊》第21卷第3期〔1982

年 11 月〕）、〈《東坡書傳》之特色及其對蔡沈《書集傳》之影響〉（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82 年）二文，對於蘇軾治《尚書》的疑古立場以及依據新文化認知詮釋經文的特點頗有論述。

除了陳先生的作品之外，蔡根祥先生亦曾於一九九四年完成〈蘇軾之《尚書》學考〉一文（《臺北工專學報》第 27 之 1 期〔1994 年 3 月〕），該文經修飾後收入蔡先生的博士論文《宋代尚書學案》。

（三）王安石

臺灣學界關於王安石《尚書》學的研討，主要集中於程元敏先生一人，程先生自一九七七年起即陸續發表〈《尚書新義》〈虞書〉五篇輯考彙評〉（《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6 卷第 2 期〔1977 年 12 月〕）等七篇專文，隨後彙集成為專書《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 年 7 月）。程先生窮數年之力，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尚書》專著，於八十五部作品當中輯得《尚書新義》佚文五五八則、各家評論二八二則，王安石《尚書》學的樣貌可以說至此方得顯明。

除了程先生的《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一）——尚書》之外，蔡根祥先生亦曾於一九九四年完成〈王安石之《尚書》學考〉一文（《臺北工專學報》第 27 之 2 期〔1994 年 7 月〕），該文經修飾後收入蔡先生的博士論文《宋代《尚書》學案》。

（四）林之奇

林之奇的《尚書》學專著名為《尚書全解》，臺灣學界素無論述，直至一九九三年明道管理學院中國文學系林登昱先生撰寫〈《尚書全解》之寫作動機及體例探析〉（《孔孟月刊》第 31 卷第 12 期〔1993 年 8 月〕）一文，方纔首見關注，隨後林先生又撰寫〈南宋《尚書》學略論——論林之奇《尚書全解》之歷史地位〉（《經學研究論叢》第一輯〔1994 年 4 月〕）一文。

一九九四年五月，林先生彙整上列二文，並擴充補全其他相關論題，完成《林之奇《尚書全解》研究》一書（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 年 5 月），臺灣學界對於林之奇的《尚書》學的關注至此才稱得上較為全面。

（五）朱熹

朱熹針對《尚書》所發的探討言論為數頗多，然而自一九四九年至今，臺灣學界尚未出現以朱熹《尚書》學為題的專門著述，而單篇論文為數也不多。最早針對朱熹《尚書》學發表性質較為完整議論的學者是國史大師錢穆先生，錢穆先生撰著

《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一書，於〈朱子之《書》學〉單元中討論朱熹的《尚書》學。其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劉人鵬先生於碩士論文《陳弟之學術》（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8年5月）的附錄中以〈論朱熹未嘗疑古文《尚書》偽作〉為名，探討朱熹對古文《尚書》的看法與態度，否定朱熹認為古文《尚書》為偽造的說法。

除了錢、劉兩位先生的論述之外，蔡根祥先生亦曾於一九九五年完成〈朱熹之《尚書》學考〉一文（《臺北工專學報》第28之2期〔1995年3月〕），該文經修飾後收入蔡先生的博士論文《宋代《尚書》學案》。

（六）蔡 沈

蔡沈的《尚書》學撰著為《書集傳》，這部奉師命（朱熹）而撰寫的《尚書》學專著，刊版印行流傳之後迅速地成為宋代《尚書》學的代表作。相較於其他各家，臺灣學界對於蔡沈《書集傳》的討論數量最多。第一篇以《書集傳》為探討對象的著作是宋鼎宗先生的〈《尚書》蔡《傳》匡謬篇〉（《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篇第14卷〔1979年5月〕）一文，隨後則是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古國順先生所撰寫的〈蔡沈《書集傳》之研究論著述評〉（《臺北師專學報》第12期〔1980年6月〕）。在宋、古兩位先生之後，臺灣學界為文探討蔡沈《尚書》學相關議題的學者是程元敏先生，程先生撰寫〈朱熹、蔡沈師弟子《書序辨說》版本徵孚〉，討論《書序辨說》的版本與流傳問題。

至於專書論著方面，游均晶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五月發表〈蔡沈《書集傳》考述〉（《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3期〔1996年5月〕）一文，隨後並完成碩士論文《蔡沈《書集傳》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7月）。該書分別討論「《書集傳》的成書經過、版本、流傳」、「《書集傳》中的漢、宋學問題」、「《書集傳》對《尚書》篇第與〈書序〉的看法」、「《書集傳》在《尚書》學發展史中的地位」等論題，對於蔡沈的《尚書》學以及《書集傳》可以說有相當完整的解析與評論。

除了上述諸文，蔣秋華先生曾撰寫〈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評初探〉（收錄於《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6年6月〕）一文，針對明代學者關於蔡沈《書集傳》的評論進行整理分析。

（七）王 柏

王柏的《尚書》學專著是《書疑》，臺灣學界對於王柏有所探討的學者僅有程

元敏先生。程先生撰〈書疑考〉（《中國書目季刊》第6卷第3、4期合刊〔1971年6月〕）、〈王魯齋之洪範說〉（《孔孟學報》第23期〔1972年4月〕）兩篇專著，二文後經會整修飾，納入程先生博士論文《王柏之生平與學術》討論王柏《尚書》學的卷帙當中。

伍、《詩經》

臺灣學界以宋代《詩經》學為範疇而興起的探討活動一向頗為熱烈，不但作品數量多達一一〇篇，同時起始的時間也較其餘各經為早，經過四十多年的探尋，臺灣學者對於宋代《詩經》學的研究成果主要展現在「宋代《詩經》學整體風貌」、「《詩經》學特定議題」、「個別學者的《詩經》學」等層面上。

一、宋代《詩經》學的整體研究

臺灣學界最早以宋代《詩經》學整體樣貌為題的討論是公方苓先生的〈宋元明《詩經》學〉（《中央日報》，1957年6月5日—21日）一文，由於該文討論的範圍涵蓋宋、元、明三代，因此所論所述都僅及表面，作者於文中大略敘述了宋儒「反〈詩序〉」、「棄漢、唐舊說」、「淫詩刪詩說」、「以己意說詩」等特點，並對宋代《詩經》學大家略作敘述。

〈宋元明《詩經》學〉一文發表二十餘年之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忠慎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完成專著《宋代之《詩經》學》（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4年6月），黃先生除了在全書首章〈宋代《詩經》學著述解題〉當中以清人朱彝尊所編《經義考》載錄的宋代《詩經》學著述百餘種為據，對宋代各家《詩經》學進行評議之外，並整體性地論述宋代《詩經》學的特色。其後則分別討論宋代《詩經》學名家歐陽脩（《詩本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傳》、《詩辨妄》以及《六經奧論》）、程大昌（《詩論》）、朱熹（《詩集傳》）等人對《詩經》的詮說及其《詩經》學特色。在〈結論〉一章當中，黃先生特別強調「反毛」、「反鄭」、「反〈詩序〉」等現象，認為是宋代《詩經》學最為緊要的特點，同時也是宋人治《詩經》所以異於漢、唐諸儒的關鍵。一九八八年，黃先生截取《宋代之詩經學》書中關於鄭樵、程大昌、朱熹的論述，於補苴整編之後以《南宋三家《詩經》學》為名印刷刊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8月)。

除了以上三部論述，汪惠敏先生亦以宋代《詩經》學為題撰寫〈宋代之《詩經》學〉（《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17卷〔1988年6月〕）一文，討論宋代學者對於〈詩序〉以及鄭《箋》的態度以及宋代《詩經》學諸說。

至於專就宋代《詩經》學著述加以考訂的部分，臺南女子技術學院陳文采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完成《兩宋《詩經》著述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8年6月）一書。該書關照的層面包括：

其一，宋代《詩經》研究之背景及流派。

其二，現存宋人《詩經》著述三十九種。針對每部專著分作者、內容、評述、卷本四項詳加敘述。

其三，輯佚書。就後人輯佚所得宋代《詩經》學九種詳加考訂敘述。

其四，未見書。依成書年代為序，針對諸家目錄有案卻無由得見的百餘部宋代《詩經》學專著詳實考證。

全書最末並附錄〈歷代書錄著錄兩宋《詩經》著述一覽表〉、〈現存宋人《詩經》著述收藏情形一覽表〉等表格，對於有志研探宋代《詩經》學的學者頗稱便捷。

此外，黃忠慎先生亦曾於一九九四年以《經義考》所載北宋《詩經》學諸書為範疇，撰成〈《經義考》所載今存或可考之北宋《詩》學要集述評〉（《孔孟月刊》第32卷第6期〔1994年2月〕），對北宋時期《詩經》學諸書頗加考訂分析。

二、研究宋代《詩經》學的特定議題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學界針對宋代《詩經》學家所論，特定議題提出討論敘述的學者僅有程元敏先生，之所以會出現如是狀況，箇中原由在於學者的類似討論均指向特定一家或少數幾家，並未以通觀立場檢視《詩經》學特定議題在宋代顯現的特有性格以及發展脈絡。

程先生論述的主題有二，一是宋人對於〈國風〉中「私情詩」（即學界通稱的淫詩）的觀點，一是宋人反〈詩序〉運動的內涵及影響。關於第一個議題，程先生於一九七五年撰寫〈〈國風〉私情詩宋人討原〉（《中外文學》第4卷第2期〔1975年7月〕）一文，探討宋代學者「淫詩說」的梗概；針對第二個論題，程

先生則發表〈兩宋之〈詩序〉運動及其影響〉（《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2集〔1968年11月〕）一文，探討兩宋學者對於〈詩序〉的批判行為以及影響。

三、研究宋代個別學者的《詩經》學

由一九四九年至今，較受臺灣學者重視並且為文研討論述的宋代《詩經》學家計有歐陽脩、程顥、程頤、王安石、蘇轍、鄭樵、朱熹、呂祖謙、王柏等九人，而學界對於各家的討論狀況如下：

（一）歐陽脩

臺灣學界以歐陽脩《詩經》學為範疇進行的探討活動主要集中於一九九〇年之前，歐陽脩的《詩經》學專著名為《詩本義》，一般而言學者的討論也都以《詩本義》為資取對象。

一九七六年，何澤恆先生完成〈歐陽脩之《詩經》學〉（《孔孟月刊》第15卷第3期〔1976年11月〕）一文，首開研究風氣，隨後賴炎元先生發表〈歐陽脩的《詩經》學〉（《中國國學》第6期〔1978年4月〕）、趙制陽先生撰寫〈歐陽脩《詩本義》評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3卷第9期〔1980年9月〕）、裴普賢先生完成〈歐陽脩《詩本義》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幼獅學誌》第16卷第2期〔1980年12月〕）、黃忠慎先生著成〈歐陽脩《詩經》學之評價〉（《孔孟月刊》第24卷第7期〔1986年3月〕），對於歐陽脩《詩經》學的特色以及對後世學者的影響都進行了詳盡的敘述，特別是裴先生撰寫的〈歐陽脩《詩本義》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一文，對於朱熹援用歐陽脩《詩》說的部分特加探討，頗有助於學者了解宋代《詩經》學發展進程以及歐陽脩《詩經》學的影響。

在專門著述方面，裴先生於一九八一年撰成《歐陽脩《詩本義》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7月）一書，探討主題包括：

其一，《詩本義》的書名、卷帙、版本。

其二，《詩本義》的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的影響。

其三，歐陽脩探求詩作本意與詩人志向的方法。

其四，《詩本義》中「一義解」二十篇對詩義的解說以及「取捨義」十二篇對於《毛傳》、《鄭箋》、《詩》歧義的取捨。

其五，〈時世論〉、〈本末論〉（二論）以及〈豳問〉、〈魯問〉、〈序問〉

（三問）的內涵。

其六，〈統解〉九篇的內容。

其七，歐陽脩對於鄭玄《詩譜》補亡行爲的內涵。

在裴先生之後，趙明媛先生也於一九九〇年以歐陽脩《詩本義》爲中心撰寫碩士論文《歐陽脩「詩本義」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0年6月），全書探討主題有三：《詩本義》對《詩經》諸篇的觀點、《詩本義》的詩文詮釋意識、《詩本義》關於詩作義蘊的看法。

（二）程顥、程頤

如前所述，二程並無《詩經》學專著，探研二程關於《詩經》的見解，必須透過《語錄》或文集。臺灣學界針對二程《詩經》學進行探論的學者，是撰寫《二程《詩》《書》義理求》的蔣秋華先生。對於二程的《詩經》學，蔣先生提出的論述重點有三：

其一，討論〈詩序〉的來源及正確性。

其二，討論二程解析詩作的觀點與得失。

其三，討論詩句「唯天之命」的歷史意義、哲學性格以及義理指向。

（三）王安石

臺灣學界關於王安石《詩經》學的研討，主要集中於程元敏先生一人，程先生自一九七九年起即陸續發表〈《詩經新義》輯考彙評——〈詩大序〉及〈周南〉〈召南〉各篇〉（《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2卷第4期〔1979年4月〕）等十篇專文，隨後彙集成爲專書《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二）——詩經》（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9月）。程先生窮數年之力，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詩經》專著，於六十一部作品當中輯得《詩經新義》佚文一〇四〇則、各家評論二七三則，王安石《詩經》學的樣貌可以說至此方得顯明。

（四）蘇轍

蘇轍撰有《詩集傳》一書，臺灣學界唯一針對蘇轍《詩經》學進行完整討論的是陳明義先生，陳先生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完成碩士論文《蘇轍《詩集傳》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全書的關照的議題包括：

其一，《詩集傳》的成書經過、版本、體例。

其二，蘇轍說《詩》廢除〈詩序〉以及對於《詩經》基本問題的意見。

其三，蘇轍對於漢、唐諸儒《詩》說的批駁與反省。

其四，《詩集傳》在《詩經》詮釋史的地位。

除了陳先生之外，趙制陽先生亦曾於一九九六年發表〈蘇轍《詩集傳》評介〉（《孔孟學報》第71期〔1996年3月〕）一文。

（五）鄭樵

鄭樵著有《詩傳》、《詩辨妄》以及《六經輿論》等專著，是宋代經學家當中批駁漢、唐經說最為強烈的人物之一。臺灣學界對於鄭樵《詩經》學的討論啓始於阮廷焯先生的〈鄭樵《詩辨妄》考輯〉（《聯合書院學報》第7期〔1969年6月〕）一文，文中阮先生針對已經亡佚的《詩辨妄》一書進行了輯佚以及考訂的工作。在阮先生之後，分別有于維杰先生撰寫〈鄭樵《詩》學考〉（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67年）、黃忠慎先生完成〈鄭樵及其《詩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20卷第4期〔1987年4月〕）、賴炎元先生發表〈鄭樵的《詩經》學〉（收錄於《第一屆經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94年4月〕）、趙制陽先生撰成〈鄭樵《詩經》論文評介〉（《孔孟學報》第72期〔1996年9月〕）。

（六）朱熹

朱熹的《詩經》學專著是《詩集傳》，該書刊行問世之後，迅速成為學者研讀《詩經》無可或缺的標準，也成為宋代《詩經》學的代表作品。由於朱熹堪稱宋代《詩經》學魁首翹楚，是以臺灣學界對於朱熹《詩經》學的探討最為熱烈，由主題分類的角度切入，可以發現四十餘年以來臺灣學者針對朱熹《詩經》學書發的討論研議計有以下幾項：

其一，討論朱熹《詩經》學的特色。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以朱熹《詩經》學整體面貌為探討主題的論述約有二十五篇，較為重要的著作有戴君仁先生的〈朱子《詩集傳》微旨〉（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72年）、陳美利先生的《朱子《詩集傳》釋例》（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2年6月）、賴炎元先生的〈朱熹的《詩經》學〉（《中國學術年刊》第2期〔1978年6月〕）、錢穆先生的〈朱子之《詩》學〉（收錄於《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李再薰先生的《朱子《詩經》學要義通證》（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2年6月）、左松超先生的〈朱熹論「詩」主張及其所著「詩集傳」〉（《孔孟學報》第55期〔1988年4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林慶彰先生的〈朱子對傳統經說的態度——以朱子的《詩經》著述為例〉（收

錄於《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3年5月〕）、洪春音的《朱熹與呂祖謙《詩》說異同考》（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6月）等篇。此外，對於朱熹《詩經》學之中的一項議題——朱熹說《詩》觀點的前後期差異，潘重規先生於一九六七年針對朱熹早年《詩經》學著作《詩序辨說》撰成〈朱子〈詩序〉舊說敘錄〉（《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9期〔1967年9月〕），並於一九八二年著成〈朱子說《詩》前後期之轉變〉（《孔孟月刊》第20卷第12期〔1982年8月〕）一文率先加以論述；其後何澤恆先生亦撰寫〈朱子說詩先後異同條辨〉（《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8卷第1期〔1988年6月〕）一文，以朱熹早年的《詩經》學著作——《詩序辨說》與晚年的《詩經》學著作——《詩集傳》相互比較，凸顯朱熹說《詩》觀點的前後轉變，尤其能夠展現朱熹《詩經》學演化的轉折。

其二，討論朱熹的淫詩說。朱熹基於教化的觀點將〈國風〉當中的某些詩篇歸類為淫詩，影響後世學者甚鉅，臺灣學界針對此說抒發意見的有程元敏先生的〈朱子所定〈國風〉中言情詩研述〉（《孔孟學報》第26期〔1973年9月〕）、王春謀先生的《朱熹《詩集傳》「淫詩」說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9年6月）、蔡根祥先生〈朱熹《詩集傳·鄭風》淫詩說平義〉（《孔孟月刊》第25卷第1期〔1986年9月〕）等篇。

其三，討論朱熹對「六義」看法。〈詩序〉有「六義」之說，是歷來學者分析詩篇性質以及詩句創作方式的準繩，朱熹撰寫《詩集傳》，對於詩篇的屬性、尤其是詩句的創作屬性迭有說明，後世學者於研究朱熹《詩經》學之際總會有所關照。臺灣學界專就此項議題進行討論的論述有四，一是魏靖峯先生的〈從「詩集傳」看〈十五國風〉賦比興的用法〉（《孔孟月刊》第24卷第4期〔1986年12月〕），一是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程克雅先生的《朱熹、嚴粲二家比興釋「詩」體系比較及其意義》（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年6月），一是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林葉連先生的〈朱子對興義解釋及其後果〉（收錄於《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一是趙明媛先生的〈釋朱熹《詩集傳》之「賦比興」〉（《勤益學報》第15期〔1997年11月〕）。

其四，討論《詩集傳》叶韻說所表現的語音現象。朱熹撰《詩集傳》，以叶韻方式表現詩句中文字的讀音，由於《詩集傳》所表現的是當時的語音，是以以宋代

語音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幾乎都視《詩集傳》為重要依據。臺灣學界最早以《詩集傳》叶韻說為研究資取的論述，是謝信一先生所撰寫的《由《詩集傳》叶韻說看朱子時代的語音現象》（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66年6月）一書。隨後許世瑛先生亦以《詩集傳》為據，自一九七〇年起連續發表了〈廣韻全濁上聲字朱熹口中所讀聲調考（《詩集傳》之聲韻研究）〉（《幼獅學誌》第9卷第3期〔1970年9月〕）等論文十篇，除了展現朱熹時期的語音現象之外，也充分凸顯了《詩集傳》以叶韻方式標註經文讀音的貢獻。

（七）呂祖謙

呂祖謙的《詩經》學著述是《呂氏家塾讀詩記》，呂祖謙與朱熹交好，二者的學術關係常常是學者探討的重點。臺灣學界關於呂祖謙《詩經》學的論述，啟始於賴炎元先生的〈呂祖謙的《詩經》學〉（《中國學術年刊》第6期〔1984年6月〕）。隨後有郭麗娟先生撰寫《呂祖謙《詩經》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10月）一書，對於呂祖謙的《詩經》學有較為完整的討論。此外，趙制陽先生亦發表〈《呂氏家塾讀詩記》評介〉（《孔孟學報》第74期〔1997年9月〕）一文。

（八）王 柏

王柏的《詩經》學專著為《詩疑》，是宋代諸位《詩經》學家當中主張刪卻〈國風〉當中「淫詩」最力的學者。臺灣學界以王柏《詩經》學為討論主題的主要論述是程元敏先生撰寫的《王柏的《詩經》學》（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66年6月）一書，程先生於書中討論的議題包括：

- 其一，王柏的「淫詩」說。
- 其二，王柏刪卻〈國風〉中詩篇的理由、篇數、篇名。
- 其三，王柏解詩的態度及方法。
- 其四，王柏對「二南」的說解。
- 其五，王柏《詩經》學的影響及相關批評。

除了《王柏的《詩經》學》之外，程先生並於一九六七年發表〈論王柏於〈閟宮〉章句之改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2期〔1967年10月〕）一文。此外，趙制陽先生亦曾以《詩疑》為題，撰寫〈王柏「詩疑」評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5期〔1984年5月〕）一文。

陸、《三 禮》

一般而言，《三禮》學相關討論所涵蓋的範疇有「《禮》學總論」、「《周禮》學」、「《儀禮》學」、「《禮記》學」，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以《三禮》學為研討命題的論述約有三十五篇，其中「《禮》學總論」二十五篇上下、「《周禮》學」約五篇、「《儀禮》學」約五篇、「《禮記》學」則只有一篇。

一、《禮》學總論

臺灣學界以宋代《禮》學為討論範疇的二十餘篇論述之中，可以大致區分成討論《禮》學整體風貌、討論個別學者的《禮》學兩項。

（一）《禮》學的整體研究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禮》學整體風貌的論述，主要有蕭公彥先生的《〈禮〉學之內涵與北宋《禮》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8年6月）、汪惠敏先生的〈宋代之《禮》學〉（《輔仁國文學報》第5集〔1989年6月〕）以及吳萬居先生的《宋代《三禮》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7月）三部：

其一，《〈禮〉學之內涵與北宋《禮》學的發展》。本書由歷史環境變動的角度切入，首先探討宋代儒學與《禮》學建構的原因，隨後以「北宋諸儒所重建之《禮》學思想的內涵」、「北宋《禮》學發展的趨勢」、「北宋的《禮》學著述」、「北宋禮樂制度的建構」為討論議題，試圖釐清北宋《禮》學的建構發展進程。

其二，〈宋代之《禮》學〉。本文以《周禮》、《儀禮》、《禮記》為主要區隔，逐家敘述宋代《禮》學家著作的特色與《禮》學觀點。由於陳述的內容較為簡要，也缺乏時代性的整體聯繫，基本上較適合初識宋代《禮》學的學者研讀。

其三，《宋代《三禮》學研究》。本書首先針對宋儒「隆《禮》」的因素詳加討論，接著依《周禮》、《儀禮》、《禮記》的順序討論宋代《禮》學的發展。討論的重點包括宋儒治《禮》學的學者與相關著作、宋儒治《禮》學的重點、宋儒《禮》學的特色。除此之外，吳先生於《周禮》部分特別提舉王安石《周禮新義》、於《儀禮》部分特別提舉朱熹《家禮》，對於這兩部影響宋代《禮》學研究以及社會文化發展甚深的專著詳加討論，頗能凸顯王安石、朱熹在宋代《禮》學發展史上

的地位。

（二）研究個別學者的《禮》學

截至目前為止，受到臺灣學界重視並為文探討的宋代《禮》學家計有聶崇義、李觀、張載、朱熹等四人，諸家論述的相關狀況如下：

其一，聶崇義。聶崇義為宋初官方禮樂制度的重要建構者，所編纂的《三禮圖集注》一書，為後世《禮》學研究者的重要依據，臺灣學界以《三禮圖集注》為討論議題的論著是林碧琴先生的《聶崇義「三禮圖」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3年6月）一書。該書以聶崇義的生平與《三禮圖》的編纂經過為起始，以《三禮圖》的體例、內容、取材對象、價值為討論重心，對於學者瞭解《三禮圖》以及聶崇義的《禮》學頗有助益。

其二，李觀。臺灣學界針對李觀《禮》學進行討論的著作有二，一是金中樞先生的〈李泰伯的《禮》論〉（收錄於《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8年9月〕），一是胡彩紋先生的《李觀《禮》學析論》（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年6月）。

其三，張載。臺灣學界關於張載《禮》學的第一篇論著是呂光華先生撰寫的〈張載之《禮》學〉（《孔孟月刊》第22卷第2期〔1983年10月〕），隨後黃麗香先生亦以張載《禮》學為題撰寫〈張載之《禮》學〉（《孔孟月刊》第25卷第7期〔1987年3月〕）一文。

其四，朱熹。臺灣學界對於朱熹《禮》學的關注較深，一九八三年，錢穆先生完成〈朱子之《禮》學〉（收錄於《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的撰寫，開啓了學者研探朱熹《禮》學的風氣。在錢先生之後，高明先生撰寫〈朱子的《禮》學〉（《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11期〔1982年6月〕）、林美惠先生完成《朱子《禮》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年6月）、賴文華先生撰有〈朱子《禮》學中的婦女〉（《中國文化月刊》第205期〔1997年4月〕）。

二、《周禮》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周禮》學的論著，全數集中在程元敏先生對於王安石《周禮新義》學的研討之上。程先生自一九八五年起即陸續發表〈《周禮新義》版本與流傳〉（《臺大中文學報》第1期〔1985年9月〕）等專文，並彙集研究成果為

專書《三經新義輯考彙評(三)——周禮》(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12月)。程先生窮數年之力,參考宋、元以後文集、史籍、筆記及《三禮》專著,於八十五部作品當中輯得《周禮新義》佚文七三八則、各家評論二一九則,王安石《周禮》學的樣貌可以說至此方得顯明。

三、《儀禮》

臺灣學界以宋代《儀禮》學為研討議題的論著較為緊要者有三,而且都是以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為主題,分別是戴君仁先生撰寫的〈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孔孟學報》第14期〔1967年9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人及修書年歲考〉(《文史哲學報》第14期〔1967年10月〕)二篇,以及張經科先生撰寫的《〈儀禮經傳通解〉之家禮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9年6月)一書。

四、《禮記》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學界以宋代《禮記》學為題的論述可謂鳳毛麟角,僅有吳萬居先生撰寫的〈宋代《禮記》學研究〉(《光武學報》第17期〔1992年5月〕)一文,本為後來經過潤飾補苴之後納入吳先生的博士論文《宋代《三禮》學研究》之中。

柒、《春秋》及《三傳》

自臺灣學界開始就宋代《春秋》學加以討論之後,學者關注的重點一直都圍繞在整體《春秋》學的研究,換言之,臺灣學界針對宋代學者關於《三傳》諸般論述進行的探究相當稀少。之所以出現如是狀態,肇因於宋代學者治《春秋》習慣以自身體認直探經文,對於《三傳》不甚尊崇,甚或嚴加批駁,同時也絕少針對《三傳》進行注釋疏解工作。分析資料結構,可以知道臺灣學界關於宋代《春秋》學的三十多篇論述當中,二十餘篇的討論對象是《春秋》學,其餘十篇的研究主題則與《左傳》有關,至於探討宋人《公羊傳》、《穀梁傳》相關學說的著作,在臺灣學界仍然是絕無僅有的狀態。

一、《春秋》學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春秋》學的討論大致可區分為三，一是探究宋代《春秋》學的整體風貌，一是研討宋代《春秋》學當中的特定議題，一是探討個別學者的《春秋》學。

（一）宋代《春秋》學的整體研究

臺灣學界對於宋代《春秋》學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學者是宋鼎宗先生，宋先生於一九八三年撰成《〈春秋〉宋學發微》（臺南：友寧出版公司，1982年2月）一書，該書討論的種要議題如下：

- 其一，宋代《春秋》學的淵源濫觴。
- 其二，宋代重要《春秋》學家的學術特色。
- 其三，宋代《春秋》學中的尊王思想。
- 其四，宋代《春秋》學中的攘夷思想。
- 其五，宋代《春秋》學家對於《春秋》義理的詮釋與發揮。
- 其六，宋代《春秋》學的價值與貢獻。
- 其七，宋代《春秋》學的影響。
- 其八，漢、宋《春秋》學的異同。

在宋先生之後，汪惠敏先生亦曾以宋代《春秋》學為題撰成〈宋代之《春秋》學〉（收錄於《宋代經學之研究》〔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89年4月〕）一文，文中列舉「會通《三傳》」、「棄《傳》從《經》，以己意解經」、「以理學觀點解《春秋》」、「以《春秋》學為經世指導」等現象做為宋代《春秋》學的特色。此外，汪先生也綜理分析《四庫全書總目》所錄諸書提要撰寫〈《四庫全書》提要對宋儒《春秋》學評騭之態度〉（《中國書目季刊》第22卷第3期〔1988年12月〕）一文，敘述四庫館臣對於宋代《春秋》學的評價。

除了宋、汪兩位先生之外，臺灣學界針對宋代《春秋》學整體風貌行討論的還有簡福興先生撰寫的〈宋代《春秋》學特色形成之探討〉（《高雄工商專校學報》第22期〔1990年12月〕）以及蔡鴻江先生撰著的〈宋代《春秋》學初探〉（《高苑學報》第6卷第1期〔1997年2月〕）兩篇論文。

（二）研究宋代《春秋》學中的特定議題

截至目前，受到臺灣學界關注而撰寫專文討論的宋代《春秋》學特定議題僅有

「尊王思想」一項。針對這項論題，倪天惠先生撰有《宋儒《春秋》尊王思想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2年6月）、〈論宋儒《春秋》尊王思想之形成〉（《今日中國》第146期〔1983年7月〕）兩部著作，宋鼎宗先生撰著〈宋儒《春秋》之尊王說〉（《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篇第19卷〔1984年3月〕）一文。

（三）討論個別學者的宋代《春秋》學

臺灣學界所關注的宋代《春秋》學家，目前為止較重要的有劉敞與胡安國二者，相關的論述情況如下：

其一，劉敞。劉敞的《春秋》學專注包括《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秋說例》、《春秋文權》數部，是宋代《春秋》學新路徑得以開闢的重要人物，臺灣學界當中以劉敞《春秋》學為探討主題的著作是羅清能先生的《劉敞《春秋》學研究》（花蓮：真義出版社，1987年6月）一書，該書以「劉敞議論《三傳》的得失」、「劉敞詮釋《春秋》的方法」、「劉敞《春秋傳》的內容」、「對於劉敞《春秋》學的商榷」為主軸，討論劉敞《春秋》學的得失與價值。

其二，胡安國。胡安國的《春秋》學專著名為《春秋傳》，是宋、元、明及清代初年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春秋》學作品，與《三傳》合稱「四傳」，因此歷來以「胡《傳》」為研究主題的論述遠較其他宋代《春秋》學著作為多。臺灣學界最早討論胡安國《春秋》學的學者是宋鼎宗先生，宋先生於一九七八年發表〈胡安國《春秋》砭宋說〉（《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篇〔1978年5月〕）一文，隨後又撰成《《春秋》胡氏學》（臺南：友寧出版公司，1978年6月）一書，宋先生於書中以「胡安國治《春秋》的態度與方法」、「胡安國的《春秋》經世說」、「胡安國的《春秋》寓宋說」、「對於胡安國《春秋傳》之批評」為主軸，充分探討胡安國《春秋》學的特色。在宋先生之後，以胡安國《春秋》學為題的論述，包括了簡福興先生的《胡氏《春秋》學研究》（臺南：新禾圖書公司，1982年）、羅清能先生的《胡氏《春秋》傳研究》（花蓮：真義出版社，1989年1月）以及汪嘉玲先生的《胡安國「春秋傳」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5月）等三部。

二、《左傳》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左傳》學的十部探究論著中，有九部與呂祖謙的《東萊博

議》有關，而九部著作之中，又有六部為語體文翻譯與注釋性質的作品，換言之，純然針對《東萊博議》或以《東萊博議》為中心的呂祖謙《春秋》學而進行探究的論文僅有三部。這三部分別為林建勳先生的《呂東萊的《春秋》學》（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年6月）、吳萬居先生的〈呂祖謙《東萊博議》錐指〉（《光武學報》第13期〔1988年5月〕）以及蕭之華先生的〈秉《春秋》快筆誅奸雄之心——談呂祖謙及其《東萊博議》〉（《文藝月刊》第243期〔1989年9月〕）。

臺灣學界討論宋代學者《左傳》學的另一部作品，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素卿先生的〈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述略——《左傳》學的考察〉（《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年第1期〔1996年6月〕）一文。

捌、《四書》

經學研究發展至宋代產生的重大變化之一，便是所謂「《四書》學」的勃興。除了經文當中某些哲學概念能夠被獨立提出來討論、有助於宋儒思想體系的建構之外，由研讀《四書》入手、進一步探研《五經》（或《六經》）的治經方式以及理念，應該也是宋代《四書》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以宋代《四書》學為論題的著述約在一〇〇篇上下，其中包含了關於《四書》的整體討論二十篇、有關《論語》的論述三十篇、研究《孟子》的論文二十篇、述及《大學》的議論二十二篇、涉及《中庸》的著作八篇。

一、《四書》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四書》學的論述，就問題取向而言可以說相當地集中，在將近二十篇的論文之中，僅有程元敏先生以《四書》與的編次與傅武光先生以宋代整體《四書》學發展史為議題進行討論，其餘諸篇都是以朱熹的《四書》學與朱熹編注的《四書集注》為探討範疇。

談論宋人編次《四書》的原來順序，是程先生〈談《四書》原來的編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孔孟月刊》第5卷第3期〔1966年11月〕）一文的重心，程先生彙整宋人編次《四書》的進程以及研讀《四書》的方法，認定《四書》的編次應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而非

現今所見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傅武光先生於一九七三年完成《四書學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3年6月）一書，雖然全書討論的不僅止於宋代《四書》學，但是傅先生在該書論及宋代《四書》學的部分當中，對於《四書》學體系的形成、宋儒《四書》學的特色、宋代重要《四書》學家以及宋代《四書》學的影響等論題均進行詳細論述，對於學者瞭解宋代《四書》學甚有助益。

關於朱熹的《四書》學，臺灣學界最早為文討論的學者是陳鐵凡先生，陳先生於一九六二年發表〈朱子與《四書》〉（《孔孟月刊》第1卷第1期〔1962年9月〕）一文，首開討論風氣。隨後以朱熹《四書》學為探討中心的論述，包括陳宗敏先生的〈朱子與《四書》〉（《孔孟月刊》第7卷第2期〔1968年10月〕）、錢穆先生的〈朱子之《四書》學〉（《復興崗學報》第6期〔1969年6月〕）等篇。

至於專以《四書集注》為題的最早相關論著，則是黃彰健先生撰寫的〈論《四書章句集注》定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1956年12月〕）一文，隨後的重要作則有陳鐵凡先生撰寫〈《四書章句集注》考源〉（《孔孟月刊》第4、5期〔1962年9月、1963年4月〕）、錢地先生著成《朱子《四書集注》述評》（臺北：作者自印本，1985年2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董金裕先生撰有〈朱熹與《四書集注》〉（《政大專報》第70期〔上〕——人文學科類，1995年6月）。

二、《論語》

臺灣學界以宋代《論語》學為研究題材而鋪陳的論述當中，以探討朱熹《論語》學以及朱熹《論語集注》者為大宗，至於其他如邢昺編輯的《論語正義》、宋儒《論語》學的特色等議題，則偶有學者提出意見。

（一）研究邢昺的《論語正義》

邢昺的《論語正義》是宋代中央政府編輯的三部經書《正義》之一，是漢、唐《論語》學在宋代的最終展現，臺灣學界最早以邢昺《論語正義》為議題進行討論的是胡健財先生的〈邢昺《論語正義》評述〉（《孔孟月刊》第27卷第2期〔1988年10月〕）一文。其後則有蔡娟穎先生撰著《〈論語〉宋邢昺《疏》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0年6月）、柯金木撰有〈邢

昂「論語正義」論略〉（《中華學苑》第50期〔1997年7月〕）。

（二）研究朱熹《論語》學與《論語集注》

關於朱熹《論語》學與《論語集注》的討論，最早始於錢穆先生所撰寫的〈從朱子《論語》注論程朱孔孟思想歧異〉（《清華學報》新第4卷第2期〔1964年6月〕）一文，本文不僅討論了《論語集注》的特點，也同時展現了朱熹《論語》學的特色；隨後錢穆先生又撰寫〈談朱子的《論語集注》〉（《孔孟月刊》第6卷第5期〔1968年1月〕）一文。在錢穆先生之後，以朱熹《論語》學與《論語集注》為中心的論述陸續出現，其中較為緊要的計有，劉善哉先生的〈《論語》朱《注》評議〉（《學園》第5卷第6期〔1970年2月〕）、鄭浩先生的〈《論語集注》述要〉（收錄於《經學粹編》〔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6月〕）、陳大齊先生的〈《論語》朱《注》述疑〉（收錄於《淺見集續集》〔臺北：中華書局，1973年3月〕）、李紹戶先生的〈北宋《論語》注本與朱子《集注》〉（《建設》第23卷第9、10期〔1975年2、3月〕）、毛子水先生的〈《論語》朱《注》補正〉（《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14期〔1985年6月〕）、鄧秀梅先生《朱子對《論語》的詮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6月）等篇。

除了針對朱熹《論語》學以及《論語集注》鋪陳整體性討論之外，若干臺灣學者亦曾以朱熹對於《論語》某章或某字辭的詮釋為題進行論述，如黃錦鉉先生撰有〈《論語》「學而時習之」朱《注》的商榷〉（《廣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68年12月〕）、傅錫純先生著有〈談朱子注《論語》「無友不如己者」章〉（《鵝湖》第9卷第11期〔1984年5月〕）、邵祖恭先生撰著〈《論語集注》兩章商榷〉（《木鐸》第12期〔1988年3月〕）、郭鶴鳴先生撰寫〈《論語集注》「謙辭」商榷〉（《國文學報》第21期〔1992年6月〕）。

在上述諸篇之外，張德麟先生曾經將朱熹《論語集注》的說解與日人伊藤仁齋《論語古義》的說解相互參校，撰成〈「論語集注」與「論語古義」之比較——以〈公冶長篇〉為討論的中心〉（《孔孟月刊》第28卷第10期〔1990年6月〕）一文，是目前為止臺灣學界唯一針對朱熹《論語》學與日本《論語》學進行比較的論著。

（三）研究其他《論語》學議題

關於邢昺以及朱熹以外的宋代《論語》學議題，程元敏先生曾撰寫〈張栻「洙

泗言仁編」的原委〉（《孔孟學報》第11期〔1966年4月〕）一文，討論宋儒張栻的《論語》學以及對「仁」的詮釋。黃彰健先生則撰寫〈瞭解《論語》的方法——並簡論漢宋學派對《論語》的解釋〉（收錄於《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5月〕）一文，專就漢、宋《論語》學的特色以及其異進行討論。

三、《孟子》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以宋代《孟子》學為主軸的論述，大致可以區分為三項，一是探究宋代《孟子》學的整體風貌，一是討論宋代個別學者的《孟子》學，一是檢討宋代《孟子》學中的特定議題。

（一）宋代《孟子》學的整體研究

臺灣學界首先為文探究宋代《孟子》學整體風貌的學者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夏長樸先生，夏先生於一九八三年撰寫〈孟子與宋儒〉（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83年）一文，率先討論宋儒與孟子的關係以及《孟子》學在宋代的發展狀況。

在夏先生之後，趙國雄先生完成碩士論文《兩宋《孟子》著述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年6月）一書，除了考證現存宋代《孟子》學著述的版本、卷帙、學說大要之外，並根據歷來書目考辨業已亡佚的宋代《孟子》學相關著作，同時收集相關佚文。

一九九三年，方俊吉先生撰成《孟子學說及其在宋代之振興》（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3年5月）一書。方先生探討的主題有二，一是孟子的學說，一是《孟子》學在宋代的發展。在討論宋代《孟子》學的發展進程之前，方先生首先探究趙宋時期外在現實環境對於《孟子》學發達的刺激與影響，認為宋代《孟子》學之所以發達，與孟子重人格修養與重義的精神，能夠匡正當時好利慌亂的人心有關。在宋代《孟子》學的發展進程方面，方先生將宋初至宋仁宗慶曆年間定位為「地位確立期」，將宋仁宗慶曆年至宋王室南渡重建政權定位為「由激盪而振興期」，將南宋以後定位為「鼎盛期」；如是的區分方式，或許可以提供一向以內在轉變為《孟子》學發展進程的學者若干啟發。

（二）研究個別學者的《孟子》學

截至目前，較受臺灣學界重視並為文檢討的宋代《孟子》學家計有李覯、司馬光、朱熹、張九成等人，相關的論述內容如下：

其一，李觀。針對李觀《孟子》學著文研探的臺灣學者是夏長樸先生，夏先生撰有〈李觀的非孟思想〉（《幼獅學誌》第19卷第14期〔1987年10月〕）一文，專就李觀《常語》對於孟子學說與思想如「性善」、「義利」、「王霸」、「尊王與否」的質疑進行探討。

其二，司馬光。以司馬光對《孟子》的觀點為議論重心的著述，是夏長樸先生的〈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9期〔1997年6月〕）一文，本文主要針對司馬光在學術上不贊成推崇孟子進行討論，另外對於《孟子》學在宋代的興起也略有敘述。

其三，朱熹。相較於其他的論述，臺灣學界對於朱熹《孟子》學進行探究的研究成果較多，自一九七七年宋淑萍先生發表〈《孟子集注》補正〉一文（《中國書目季刊》第11卷第1期〔1977年6月〕）之後，陸續有張樹榮先生撰寫《《孟子》朱《注》性命論綜釋》（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6年6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俊傑先生撰寫〈從《孟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舊學與新知的融會〉（《史學評論》第5期〔1983年1月〕）以及〈朱子對孟子知言養氣說的詮釋及其迴響〉（《清華學報》第18卷地2期〔1988年12月〕）、楊雅婷先生著成〈朱子對於孟子中心性觀念的詮釋〉（《中國文學研究》第6期〔1992年5月〕）、楊祖漢先生著成〈朱子對孟子學的詮釋〉（收錄於《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5年5月〕）、黃瑩暖先生著成《朱子對孟子心性觀及功夫論的理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9期〔1995年6月〕）。

其四，張九成。張九成撰有《孟子傳》一書，一九九五年，蔣秋華先生以張九成《孟子傳》中言及的「義利觀」為題，撰寫〈論張九成《孟子傳》中的義利觀〉（收錄於《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5年5月〕）一文，是臺灣學界唯一討論張九成《孟子》學的著作。

（三）檢討宋代《孟子》學中的特定議題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學界綜論宋代《孟子》學家所舉特定議題的學者是黃俊傑先生，黃先生以宋儒對於孟子政治思想的討論為題，分別撰成〈宋儒對於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及其蘊涵的問題——以孟子對周王的態度為中心〉（收錄於《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5年5月〕）、〈中國詮釋學的政治學意涵——宋儒的孟子學爭議〉（《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15

期〔1997年6月〕）兩篇論著。

四、《大學》

《大學》原本為《禮記》四十九篇之一，在宋朝因受學者尊崇而取的獨立地位，對於《大學》的探討，可以說是宋儒研治經學或儒學、理學的特色，臺灣學界對於宋代《大學》說的重要討論主題可以大致區分為二，一是《大學》改本的問題，一是宋代各家的《大學》說（主要是朱熹）。

（一）討論《大學》改本的相關問題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至北宋開始出現單行本，自二程表彰《大學》並對經文有所更動之後，研治《大學》的學者幾乎都會依據自身的認定對《大學》經文進行寔改，因此，「《大學》改本」的問題就成為《大學》說發展史中的重要議題。臺灣學界最早針對宋儒《大學》改本進行討論的學者是程元敏先生，程先生於一九七二年發表〈《大學》改本述評〉（《孔孟學報》第23期〔1972年4月〕）一文。在程先生之後，陸續產生的相關論著計有王大千先生的《改本《大學》釋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4年6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李紀祥先生的《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2年6月）、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岑溢成先生的〈《大學》之單行及改本問題評議〉（《鵝湖》第9卷第5、6期〔1983年11、12月〕）、葉國良先生的〈介紹宋儒林之奇的《大學》改本〉（《幼獅學誌》第18卷第4期〔1985年10月〕）、黃進興先生的〈理學、考據學與政治：以《大學》改本的發展為例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4分〔1989年12月〕）。

諸篇當中最為緊要的，當屬李紀祥先生的《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一書，在書中探討宋儒《大學》改本的環節中，李先生討論了二程、林之奇、朱熹三個宋代較為顯著的《大學》改本系統，同時也針對濫觴於朱熹《大學》改本的「〈格致傳〉改本」系統詳加敘述，對於學者認識各家宋代《大學》改本的面貌以及意義都甚有助益。

（二）研究宋代各家的《大學》說

臺灣學界對於宋代學者《大學》說的討論，除了翟世芳先生的《二程《學》《庸》思想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6月）一

書針對二程《大學》說進行研討之外，主要集中於朱熹一人。其中較為重要的著作爲：林正華先生的〈談朱子〈大學補傳〉〉（《孔孟月刊》第15卷第7期〔1977年3月〕）、楊儒賓先生的〈朱子的〈格物補傳〉所衍生的問題〉（《史學評論》第5期〔1983年1月〕）、張亨先生的〈朱子德性修養論中的「格物致知」教〉（臺北：國科會獎助論文，1983年）。

此外，針對朱熹以及王陽明《大學》的歧異，臺灣學者也略有論述，其中較為重要的著作爲：萬心權先生的〈《大學》朱王釋義之我見〉（《孔孟月刊》第1卷第11期〔1963年7月〕）、戴君仁先生的〈朱子陽明的格物致知說和他們整個思想的關係〉（收錄於《梅園論學集》〔臺北：開明書店，1970年9月〕）、陳明仁先生的〈從朱王兩家詮釋看《大學》本義〉（臺北：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1978年6月）、周彝先生的〈朱王之異同〉（收錄於《大學論文資料彙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1年9月〕）。

五、《中庸》

臺灣學界關於宋代《中庸》說的論述當中，探究朱熹《中庸》說以及《中庸章句》的論著有三篇，一是龔樂群先生的〈評朱子《中庸章句》序〉（《學園》第6卷第10期〔1971年6月〕），一是張德麟先生的〈論朱子之「中和舊說」〉（《孔孟月刊》第15卷第11期〔1977年7月〕），一是莊錦津先生的〈從朱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管窺朱子思想〉（《孔孟月刊》第17卷第5期〔1979年1月〕）。

至於探討其他議題的重要相關論述，則有王保珍先生的〈蘇軾的《中庸》論〉（收錄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6月〕）以及程元敏先生〈論王魯齋（柏）《中庸》改本〉（《文史季刊》第2卷3、4期合刊〔1972年7月〕）兩篇。

玖、回顧與建議

在大略分析過宋代經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及內容之後，筆者以爲，臺灣學界關於宋代經學的探討，展現出以下數種現象：

其一，在研究組群方面。早年臺灣學界當中對於宋代經學投注較多心力的學術

團體明顯僅有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三處，其後則稍見擴張，各學術機構陸續有學者投入宋代經學的研究工作，其中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以及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幾處的研究成果較為集中。

其二，在研究者的學術體系傳承方面。早年臺灣學界參與宋代經學研究有成的學者為屈萬里先生、戴君仁先生，隨後專就宋代經學加以探研的則有胡自逢先生、程元敏先生、宋鼎宗先生、葉國良先生、夏長樸先生、何澤恆先生、林政華先生、汪惠敏先生等學者。當中除了少數幾位，後續的研究者與屈、戴兩位先生幾乎都有師生的直接性學術關係，而近年來對於宋代經學頗為關注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兩處，無論在經學研究的基本概念或者是主題意識方面，也都直接淵源自屈、戴兩位先生。由此可見，臺灣學界當中探研宋代經學的學術系統，絕大部分建立在屈萬里、戴君仁兩位先生的經學體系之上，這樣的現象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有所改異。

其三，就探討的主題特性而言。至目前為止，臺灣學界對於宋代經學的論著，無論探討的經書為何、議題為何，所關照的仍舊大多是一家或特定數家之說，極少出現針對某部經書或某項經學議題進行整體性討論的著作，也鮮少有學者能夠持續開創新的討論議題，換言之，關於宋代經學的任何一項整體性敘述以及新研討議題的提出，在臺灣學界仍舊闕如，需要研究者投入心力持續努力。

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學界關於宋代經學的研究論述雖然已有七六〇篇上下，但是相對於宋代經學家的經學著述以及所提出的相關論題，則可以發現尚待諸多有志於宋代經學研究的學者持續戮力的空間仍然相當廣闊。對於臺灣學界關於宋代經學研究工作的後續發展，筆者僅在此就個人淺薄認識提出若干建議：

其一，加強宋代經學發展史的撰述。筆者所謂的宋代經學發展史，並不單指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或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一類的通史通論性質著作，也包括各經或某項經學議題在宋代的發展歷史。這類性質的著作雖然不能達成詳盡詮釋經書或者解析經學議題的功能，卻可以展現出宋代經學的發展樣貌，做為學者進行深度探研的依據與指南。

其二，開發新議題。分析資料結構，可以知道除了少數學者之外，臺灣學界當中大多數對於宋代經學有所關注的研究者所討論的主題頗有重複，之所以會出現如是現象，固然是因為這些主題具備一再討論的價值，討論者缺乏整體認識與開創新

論題的意識，也是因素之一。事實上，只要深入觀察，學者不難發現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七百多部論著的探討與發揮，仍然有許多饒富趣味的議題等待學者開拓。例如宋人喜好「離經言道」，經常創作議論文章討論經學問題，學者雖然常就這些文章進行探討，但是卻從來沒有針對這項特點進行專題研討，相信在經過有條理的整體性探討之後，學者不但能夠清晰地瞭解「議論解經」的實質意義與貢獻，對於宋代經學發展的樣貌也能夠更充分認知。又如與南宋學者魏了翁同時活躍的諸多經學家，總會於著作完成之後懇請魏了翁撰寫前敘後跋，而針對這些序跋略作探討，則可以發現魏了翁縱使不是當時學術界的領袖，也必然是一派之宗，這樣的現象是不是與《宋元學案》的載錄相符，是不是具備值得學者深入推敲的成分，都是臺灣學者可以進一步探討的。

其三，加強宋人經說的蒐集。明、清以來，多位學者陸續投入漢、唐經說蒐集（包括輯佚與刊刻）的學術行為，不但提供學者進一步瞭解兩漢經學面貌的依據，同時也間接促成了經學界對於兩漢經學的闡發與論述。在經過以《經義考》為中心的各家目錄考察工作之後，學者應該可以發現宋人經說數量龐大但是亡佚頗多，探討宋代經學若僅以現存單行以及《通志堂經解》所收諸書為據，必定會失之偏頗。因此，明、清學者輯蒐佚說、整理刊行存書的學術行為，是絕對值得臺灣學界仿效遵循的。就如同程元敏先生完成《三經新義輯考彙評》而增進學界對於王安石經學的認識、並且促成後續有志於斯的學者投注心力詳加探研一般，針對宋人經說進行輯佚、整理以及刊行工作，就像是開啓寶庫與康莊大道的關鍵，對於臺灣學界宋代經學的相關研究水平必定具有鼓勵與提昇的作用。